

执政党的建设研究论丛

ZHIZHENGDANGJIAN SHEYANJIULUNCONG

湖南四清运动史

戴安林 著



研究出版社

湖南四清运动史

戴安林 著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南四清运动史 / 戴安林著.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05.6

(执政党的建设研究论丛)

ISBN 7-80168-203-3

I. 湖…

II. 戴…

III.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史料—湖南省

IV. D65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1171 号

责任编辑: 童 兴

责任校对: 辛 磬

湖南四清运动史

戴安林 著

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 1746 信箱 邮编: 100017 电话: 010—63097512)

北京市顺义向阳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201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68-203-3

全书共四册 定价: 98.00 元

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当人们翻开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把目光投射到 20 世纪 60 年代那火红的岁月，往往更多的是关注那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忽略了在它之前历史上发生过的同样令人感到沉重的一幕——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时期，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使得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基本正确转变为“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四清运动是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反复辟”、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部署而开展起来的。因此，这场运动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误区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一错误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并使之系统化，为后来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创造了重要条件。

而在全国开展的城乡四清运动中，湖南的四清运动又具有典型代表性。因为湖南是全国开展运动最早的一个省份，湖南也是全国开展运动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湖南还是在这场运动中表现的最为积极的一个省份。自 1961 年 10 月开始，至 1966 年 8 月结束，风风雨雨，曲折反复，历时五年。这场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61 年 10 月至 1963 年 4 月，是酝酿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 1963 年 5 月至 1964 年 8 月，是进行试点阶段；第三阶段，从 1964 年 9 月至 1966 年 8 月，是全面铺开阶段。中共湖南省委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率领全省人民，斗志昂扬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真诚地希望能够达到“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目的。中共湖南省委在运动中总结出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不仅对于全省方方面面的

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为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发展和制定指导全国四清运动的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对于全国四清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认真研究四清运动，尤其是认真回顾和反思湖南的四清运动，以史为鉴，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左”倾错误理论的严重危害，对于我们加深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启迪。

目 录

第一编 酝酿准备(1961年10月至1963年5月)	(1)
第一章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点指示》的出台	(1)
第二章 开展三个“五好”运动	(20)
第三章 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33)
第四章 怎样做一个好党员教育活动	(52)
第五章 省委给中央的四个报告	(61)
第二编 进行试点(1963年5月至1964年8月)	(82)
第六章 第一批试点	(82)
第七章 第二批试点	(96)
第八章 第三批试点	(108)
第九章 整训工作队	(122)
第十章 “迎丰反革命事件”	(131)
第三编 全面铺开(1964年9月至1966年8月)	(145)
第十一章 第一批全面铺开	(145)
第十二章 第二批全面铺开	(183)
第十三章 城市四清运动	(195)
结束语	(212)
参考文献	(217)

第一编 酝酿准备

(1961年10月至1963年5月)

第一章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点指示》的出台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和“一五”计划主要指标的提前实现,为湖南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果湖南沿着这一正确的方向发展下去,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将会发生令人可喜的巨大变化。然而,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往直前,一帆风顺的,往往是事与愿违,与人们美好的设想相反。因为,正当三湘四水儿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歌猛进,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在经济上一股“左”倾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急剧膨胀起来,开始蔓延泛滥;导致的结果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1957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发表讲话,严厉地批评了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指责负责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右倾保守”。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建设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

为了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中共湖南省委于1957年10月26日至11月6日在长沙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开展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大批判。这种大批判使得“左”倾急躁冒进的思想泛滥起来。会后,全省各地迅速掀起了反对“右倾保守”,提高生产计划指标的运动。同年11月至12月,相继召开的中共湖南省第一届二次会议和湖南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把全省反对“右倾保守”活动推向高潮。会议认为,在湖南“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高涨的新形势已经到来了”。据此,省一届人大五

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全民整风运动,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决议》。会议期间及会议以后,全省各地原订的经济生产指标一次一次地被拔高。这样,在广大干部群众强烈渴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和反“右倾保守”的政治压力下,湖南的“大跃进”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被发动起来了。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自古就有“洞庭熟天下足”的美誉。因此,湖南的“大跃进”运动首先从农业拉开序幕。1958年1月1日,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委联合举办元旦广播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表了《鼓起革命干劲,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年献词。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于1月31日至2月9日,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农业生产会议,确定了“十年规划,五年完成”,即要求到1962年实现原定1967年达到的指标,并提出“三年改变湖南面貌”的口号。为此,要求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80—300亿斤。比上一年增长25%—30%,农副业总产值4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3%,到1962年粮食达到450亿斤,平均亩产800斤。这些指标显然大大超过了当时全省人力、物力、财力所能承受的能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然而,有的人还认为省委提出的指标“保守”,而各地在下达这些指标时,又层层加码,使全省总指标更加膨胀,有的地区甚至提出“十年规划,一年完成”。继全省农业生产会议之后,各行各业围绕农业,也纷纷制订了各自的“跃进”指标。针对这种情况,周小舟在4月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但由于全国“大气候”的影响,这种已经膨胀起来的“跃进”空气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被压缩,相反,以更快的速度膨胀起来。到了8月初,省委也把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指标提高到400亿斤,以争取“一年实现十年粮食生产规划”。

如果说湖南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话,那么农业的“大跃进”又是从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始的。为了实现以粮食为中心的农业“大跃进”,全省广大农民群众首先被动员起来兴修水利。还在1957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委就联合发出《关于积极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的指示》,随即在全省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兴修水利高潮,并一直持续到1958年3月。全省累计用工达3.2亿多个,占农村总人口

的 50—60%，每天投入劳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 670 多万人，一共完成土石方工程 15 亿立方米，超过“一五”时期水利工程土石方总和的 10 倍。当时，这些工程几乎全是靠农民手挖肩挑完成的。广大农民怀着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忘我地辛勤劳动。当年留下的一首民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修水利的场景：

万把锄头万颗星，万颗星星当明灯，

万滴汗珠湿透土，万代幸福扎下根。

湖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步伐越来越急，要求越来越高。1958 年 4 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精神，大批“右倾保守”，提倡思想大解放，敢想敢说敢为。5 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湖南的建设速度必须加快，思想必须解放，一定要做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切实做到“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会后，全省“大跃进”形成高潮。在层层压力下，许多事物逐步走向反面。如兴修水利，就不要计划，不要测量，盲目铺开，遍地施工，造成有些工程报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因为规模过大，超过了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的承担能力。如增施肥料，就越多越好，造成禾苗疯长，只见稻草不见稻谷；如提倡深耕，就深翻土地几尺，不仅徒劳无功，反而破坏了土壤合理结构；如强调密植，就密出 2×4 寸，使禾苗无法正常生长；如农工具的改造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等运动中，出现了木制双铧犁、石质机床、竹木质的滚珠轴承、万能捶碎机，牛拉火车、竹木轨道等“奇迹”，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必然导致浮夸风的盛行。

1958 年，广大农民群众尽了最大的努力，使田里功夫做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因而农业确实获得丰收，然而在全国各地竞相大放“卫星”的影响下，湖南也开始“卫星”上天，7 月 1 日，《新湖南报》登出平江县石塘农业社水稻亩产 2522 斤的消息，13 日又登出岳阳县先锋农业社水稻亩产 6363 斤的消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对放“高产卫星”，持保留慎重的态度。要求凡报道亩产 3000 斤以上的消息，都要经过省委的批准，实际上当时水稻亩产超过 2000 斤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

全国竞相放“卫星”的形势下，周小舟也无力制止这种竞相欺上瞒下，虚报浮夸的风气。8月，省委组织省、地、县、乡、社五级干部百万人深入田间大会师，开展检查评比，再一次开展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竞赛运动，以推动秋季生产更大的跃进。运动中出现了“树红旗”、“插白旗”、“送乌龟”等过“左”的做法，使农业生产“大跃进”进一步升温。此后，“高产卫星”越放越大，越飞越高，甚至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10月下旬，《新湖南报》登出了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晚稻亩产6.6万余斤和红薯亩产56万斤的“奇闻”。粮食浮夸风造成了农业过了关和粮食吃不完的虚假景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大跃进”的高涨。

在农业率先“大跃进”的影响下，工业、交通、运输、财贸以及文教等各部门都纷纷动员起来，投入“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26日至3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工业交通会议，决定当年地方工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提高7倍，并赶上和超过农副业总产值。为此，规划五年内建成农业机械网、修配网、化学肥料网、农副产品加工网、电力网、煤炭网、交通运输网，形成一个支持农业的工业体系以推进农业机械化。会议要求贯彻“依靠群众办工业”的方针，做到“县县办工业，乡乡办工业，社社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各部门办工业”。会后，全省自上而下掀起了大办工业的新高潮。自3月中旬至6月底止，全省新建中小厂矿23万多个，平均每天创办2000多个工厂或手工工场。这些厂矿或工场，大多数是生产小农具和土化肥的，有的是原来的铁匠铺外挂上一块“机械厂”的木牌，或者在堆放灰粪的草棚前写上“化肥厂”几个字，并不真正具有“大办工业”的意义。但是，在大办工业中加快速度，新建扩建的208个大中型项目，如娄邵铁路、湘黔铁路（湘潭至金竹山）、京广铁路复线（武昌至衡阳）、湘潭钢铁厂、涟源钢铁厂、长沙汽车电器厂、拓溪水电站等，对湖南后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大搞技术革新带来的又一个困难是原材料不足，尤其是钢铁缺口很大。为此，中共湖南省委在4月份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决定1958年要求生产生铁35万吨，比两个月前制定的指标再增加1.7倍。随后，省委、省人委下达一连串指标，要求各地“由

小到大,大小结合,由土到洋,土洋结合”,发展钢铁生产。到6月初,全省已建成6000多座炼铁土炉,由一批民间铁匠指挥炼铁。6月下旬,省委在邵阳召开工业现场会议。随后土法炼铁即在全省迅速铺开,到7月时,全省炼铁土炉上升到1.8万座。8月6日至14日,全国地方高炉会议在邵阳举行,全国28个省市部分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及国家机关代表4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对邵阳地区全民大办钢铁的经验给予了肯定,提出要以“政治挂帅”,土小为主,土洋结合,多产快产生铁,保证炼钢“大跃进”。同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出将生铁生产任务增至70—105万吨。为此,省委于7月中旬召开第四次机械工业生产会议;会议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心是粮食、钢铁和机械“三大元帅”,而钢铁、机械、电力是我省工业建设上的“一、二、三”,其中又必须“以钢为钢”,带动全盘;会议不切实际地决定在今后5个月内,生产出年产能力为110万吨的炼铁设备,80万吨炼钢设备,75万吨的轧钢设备以及精密的大型电动机床和发电机等。会后,全省机械工业掀起大规模的跃进。然而,在8月中旬以前,尽管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委对钢铁生产指标一再加码,但是,毕竟还没有形成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全国产钢1070万吨的指标,要求将它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并且中央确定湖南省当年的钢铁生产任务分别为15万吨与70万吨。于是,钢铁生产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中共湖南省委8月底至9月初接连召开各种会议,布置钢铁生产“大跃进”。《新湖南报》为此连续发表《现在炼铁必须以土法为主》等6篇社论。但是,当年1月至8月全省仅生产9万吨铁和不到1万吨钢,为了在剩下的4个月里完成这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只好采取一切超常规的措施:

一、书记挂帅,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9月2日,省委、省人委联合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全省人民向钢铁大进军”。于是,一个以钢铁为中心的新的“跃进”浪潮,迅速在全省城乡掀起。来自农村、工厂、街道、商店、机关、学校的劳动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钢铁战线,全省直接加入钢铁生产行列的群众最多时达到700多万人。

二、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大搞违背科学的土法炼铁钢。从9月1

日至10月19日,全省建成的炼铁、炼钢土炉由2.6万座激增到6.5万座。

三、各行各业支持钢铁生产。农业要优先保证钢铁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机械制造业要优先制造钢铁冶炼设备,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先运输生产需要的物资,商业部门要及时收购钢铁,不论其质量如何,成本高低,都不得拒收。文艺宣传、医疗及学校等单位也要上山进厂,服务到工地。总之,各行各业“只能服从钢铁,支持钢铁,保证钢铁”。

随着人民群众大炼钢铁运动的掀起和迅猛发展,铁矿石、煤炭、冶炼设备、运输能力等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于是,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全省相继掀起了以土法为主的全民大办煤炭,大办机械、大办交通运输等项运动。挖煤、炼焦的人数仅十月份就达到了500万人。由于煤炭和焦炭不足,各地区又大砍树木甚至拆房炼铁,至十月中旬,各地区被动员起来搞运输的群众就达到了200万人,从民间抽调的人力、畜力车近20万辆,此外,还从机关、团体、部队抽调了大批汽车。

在钢铁“大跃进”的高潮中,全省各地又提前于夏秋之际,再一次掀起“大办水利”的热潮,抽调大批劳动力兴建蓄水量在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7座,即黄材、官庄、王家厂、水府庙、黄石、酒埠江和双牌水库。其中水府庙、黄石和双牌水库的蓄水量在5亿立方米以上。兴建这7座水库对湖南工农业生产发展具有长期的重要意义,但在当时承担是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广大农民群众确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经过3个月的日夜奋斗,到11月底,宣告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全年的钢铁生产计划。实际上,直到这年的年底,全省也只生产了29万吨铁,不到3万吨钢,并含硫量都大大超过了国家标准,无法使用;而且成本之高,使得省财政当年为补贴钢铁亏损支出了近1亿元。这种“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还加剧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为了保钢铁,轻工业被忽视,导致不少日用工业品脱销,大批农村劳动力抽走之后,秋、冬季作物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甚至大量已经成熟的粮食、油菜籽等也因无人收获而霉烂在地里,钢铁高指标不但刺激了钢铁工业本身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而且引起了众多部门的连锁膨胀。当年全省实际完成的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57年增长了6

倍多,由钢铁引起的各部门和基本建设指标的暴涨,又进一步加剧了交通运输业的紧张,到年底,全省积压待运的物资达 250 万吨。

随着时间的推延,“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及其危害,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于 1958 年底开始采取一些初步纠“左”的措施,使得当时日趋严重的形势有所缓解。但是,随着 1959 年 8 月“反右倾”运动的开展,使本已有所收敛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又重新泛滥起来。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参加了前一段的扩大会议。会议将中共湖南省委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接纳为会议方针。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次会议是为进一步纠正当时的“左”的错误和准备继续跃进而召开的,因此,会议前一段气氛活跃,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露出不少问题,周小舟也多次就湖南的工作发表看法。但是,由于发生了 7 月 14 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信及后来张闻天、黄克诚发言等情况以及其它原因,毛泽东不能接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较为尖锐的意见,决定扭转会议方向,错误地对彭、黄、张及周小舟等人开展批判,将他们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给予严厉处分,并且号召“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8 月 2 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举行。16 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周小舟受到“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保留中央候补委员,以观后效”的处分。庐山会议本来应该纠“左”,后来却变成“反右倾”。正如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8 月 5 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向各地、市委书记通报庐山会议精神,通报周小舟在会议上受到批判的消息。6 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干部大会、部署 8、9 两个月工农业生产提出“反对右倾思想”的口号。8 月 20 日,新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到任。8 月 22

日至9月15日,张平化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各地地县委书记及各大型厂矿、大专院校、部队及省直机关的负责干部共2000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揭发批判以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宗派活动,周小舟在会上遭到错误的批判与斗争。同时,会议对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麟,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杨第甫,省委候补委员、教育厅长方用,以及省委工业部部长章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克等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指责他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9月15日,会议通过《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问题的决议》。10月2日,周小舟被下放到浏阳县,降任中共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唐麟、杨第甫、方用、章新等人也都被撤职,下放基层。省委扩大会议后,全省县级以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在党员干部中立即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并在农村中开展整社及总路线再教育运动,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毒素”,从而坚持和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省委还要求各级党委将党内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次一并解决。

到1960年3月,县级以上机关单位的“反右倾”整风运动基本结束。运动中,全省有4600多人受到重点批判,其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354人,一共揭发出“反党集团”17个,“反党活动”若干起,他们绝大多数受到了处分。“反右倾”斗争一直搞到基层。在工业、交通、财贸、统战、政法等部门反到基层干部。在文教科技队伍中开展了“拔白旗”运动。在党外一般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中以“交心”、“大辩论”、“火烧中游”等形式进行,“反右倾”扩大到了一般职工和群众,使更多的人受到了批评和打击。农村整社结合整党、整团进行,一直到1960年春季才结束,“反右倾”反到了生产队,80万农村基层干部,1800多万社员被动员起来进行大辩论和大批判,重点是揭批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倾向”及“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一大批社员、党员、干部遭受到批判和打击。据66个县统计,被重点批判的10.3万人。

湖南是全国反右倾整风运动开展的最浩大、造成后果最严重的一个省份。运动中错整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很有见地的好同志,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其伤害的人数之多,消极影响面之广,均超过此前的各种政治斗争;在经济上使湖南当时刚开

始纠“左”的工作遭到批判与否定,致使“左”倾错误更加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

中共湖南省委于 1959 年秋至 1960 年秋再一次掀起“继续跃进”的高潮。主要开展了几个“大办”运动。

一、大办水利。从 1959 年冬至 1960 年春,仅省里安排修建的水库和塘坎就达 6 万多处,合计土石方 8 亿立方米。任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大中型水利工程 130 处,其土石方量相当于 1950 年至 1959 年十年中同类工程土石方总量的 5 倍,总干渠的长度为湘、资、沅、澧四水干流总长度的 1.5 倍。全省参加兴修水利的农村劳动力最多时达 600 余万人,直到春耕大忙季节,仍有 60 余万人在水利工地上,严重影响了冬季作物的管理和春季生产的准备。

二、大开荒。省委要求将原计划在三年内垦荒 3000 万亩的任务,争取在 1959 年冬至 1960 年春基本完成。于是,全省又有上百万劳动力顶风冒雪上山开荒,结果开了生荒丢了熟地,仅湘潭地区荒芜的田地就达 60 万亩。

三、大办生产基地。到 1960 年 2 月止,全省有 40% 以上的人民公社建立起了各种农副产品基地 555 个。由于是一哄而起,脱离实际的,结果严重妨碍了当地的生产安排。

四、大办养猪场。为了使 1960 年全省生猪生产指标在上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省委要求在全省开展一个万头猪公社、千头猪大队、百头猪生产队,十头猪食堂的“万、千、百、十集体养猪运动”,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全省建起了 14 万个养猪场,其中大的猪场有数百间猪栏。由于是仓促上马,加上管理不善,结果造成生猪大批死亡。

五、大办交通。一个冬春,全省新修公路里程相当于原有公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一,同时还修了 800 公里铁路路基,其中 200 公里铺了轨。这些工程大都质量差,有的只能报废。此外,还开展大造森林、大伐木材等运动。

在上述“大办”运动中,全省付出的劳动日达 6 亿个,比 1958 年秋冬全民大办钢铁和开展农业基本建设的用工还多 2 亿多个。它大大超出了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的许可范围,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和休养生息,给湖南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继续跃进”是在全省国民经济已经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启动的,经过一年的强制推行,终于使国民经济到了无法再继续运行下去的地步,到1960年秋冬,不仅生产建设难以为继,而且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极度困难,全省出现了普遍性的粮荒。城镇居民口粮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只有18斤口粮。在农村,农民年人均口粮只有350斤,比1957年减少近4个月的口粮,约有三分之一的地方缺粮,并且缺粮的时间较长。由于生活难以为继,人们常常是野菜、树皮、草根、糠叶充饥。全省水肿病人,妇科病人,小儿营养不良病人急剧增加,外流渡荒和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多,1960年全省3569.37万人,比上年实际减少122.58万人,从1961年开始,湖南省也和全国一道进入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经历了“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运动的风风雨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中共湖南省委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以大力发展生产,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思想的发展趋势;一种是“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留下的后遗症,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趋势。正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使得中共湖南省委在实际工作中处于微妙的、矛盾的状况。

面对“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国民经济遭遇到的严重困难,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严酷现实,中共湖南省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1年开始,对全省的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整。

一、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工业内部的关系。

在调整期间,省委和省人委要求各地一切基建项目一律纳入国家计划,绝不允许搞计划外工程。压缩是按照“关、停、并、缩、退、保”的办法分别处理,并本着“少搞不搞新建、逐步做到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分批建设,抓紧投产”的方针进行安排。仅1961年,基本建设投资就压缩到3.93亿元,比1960年减少近10亿元。1962年又进一步减少为2.03亿元。施工项目由1960年的4064个大幅度地减到1961年1515个,而在实际执行中又停建了700多个项目。这样,既把基本建设的规模放到了可靠坚实的基础上,也使国家有可能腾出更多的财力

物力去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工业的调整主要是将高指标降下来，特别是缩短了重工业战线，而对人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生产项目和日用品工业则尽全力地保。1961 年全省钢产量由 1960 年的 20.08 万吨降为 3.71 万吨；生铁产量由 78.98 万吨降到 13.7 万吨，重工业产值由 29.86 亿元降为 12.81 亿元。在全部生产资料产值中，钢铁、机器制造等“长线”产品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37.62% 降为 1962 年的 26.46%；煤、木材、有色金属等“短线”产品的比重则由 13.4% 上升到 21.65%。1961 年，全省 99 个县(市)有 70 多个县(市)成立了日用工业品生产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专门抓这一工作。据对 149 种主要小商品进行检查，能够大量供应市场的有 71 种，基本满足需要的有 57 种，供不应求的有 19 种。对支农工业也是尽力地“保”，在地方机械工业保留的企业中，有 70% 以上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

二、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减轻对农村的压力。

为了加强对厂矿企业职工及城镇人口精简压缩工作的领导，省委专门成立了精简领导小组。从 1961 年到 1963 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了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任务，全省职工人数减少 62 万余人，城镇人口减少 120 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 135 万人。这样就使全省城乡人口的比例以及工业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同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大体上相适应。

三、调整商业和手工业体制，安排和活跃市场。

省委在经过一系列调查和试点的基础上，于 1961 年 5 月制定了《湖南农村商业体制的意见》(草稿)，决定将农村中的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分开，同时恢复小商贩和集市贸易，以形成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农村集市贸易三种流通渠道。商业部门对农副产品的收购，贯彻了“先留后购”的政策。生产队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产品可以自行出售，对不属统购派购的产品，允许自由进入集市贸易。并规定对某些一二类农产品，实行奖励价、加价或议价收购。对手工业采取新的政策，认为不能把个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割掉。在 1961 年上半年，全省恢复了手工业合作组织近 4000 个，共有职工 10 万余人。

四、调整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

文化部门开展戏剧改革，组织剧团下乡巡回演出，为农民服务。